·文学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5.05.006

“明无词”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词与明词批评

王　芹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明无词”成为一种文学接受现象,《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不容忽视。《总目》以“世运说”构建明词发展状貌,对明词的评价是消极的,却很有批评策略:批评方法上标准游移,对同一词人词作的评价前后不一,而依其对明词史的整体规划做调整;词集择选上以偏概全,避开明代最优秀的词人词作,造成样本的不完备;词作批评上剑走偏锋,依清廷官方标准全面否定而未顾及明词特点。《总目》的明词批评,是馆臣一手策划下的明词唱衰史,其实质是政治本位观下的明代词史和批评史,不能从根本上揭示明词的特点和价值。今天我们应重审明词的发展历程,并对有“异量之美”的明词以更积极的评价和历史定位。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明词;明词史;明词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5-0054-09

文学史上,明词被看做千年词史的中衰期,“明无词”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文学现象。但这种状态并非自来如此,相较明人自身对明词评价的褒贬不一,清初仍“沿明季余习,以《花》《草》为宗”①,明亡至清康熙十七年之前(1644—1678),明词评价总体上褒多于贬。浙西词派形成至清末,明词才渐由“榛芜”到“亡”②。变化背后反映了评价标准的改变,“明无词”主要是以经典宋词为标准而致的结果。近年来,明词及其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主要表现在文献、词史、词学理论方面。《全明词》《全明词补编》的出版且辑佚增补成果的陆续出现,表明明代有词。《明词史》《明代词人群体和流派》相继付梓,前者为明词史建构的拓荒之作,后者预示着明词研究进入了深入细化的转型升级阶段③。词学理论上以《明代词学通论》为代表,标志着明代词学由此自成格局④。综上表明,明词不仅数量众多,且有自己的特色和内涵,学界正不断突破传统,以“异量之美”⑤重审明词。而从接受史看,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即历来对明词的“误解”中,除文艺标准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判定“明无词”这一结果中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一追溯有利于从史上梳理明词批评的发展脉络,从根源上找到并理清问题。

盘点唱衰明词的诸种说法可知,除明人基于复古思潮的自我反思以及清初词坛因审美转型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提要考辨与学术批评还原研究”(项目编号:17AZW012)。

[作者简介]王芹,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285471301@qq.com。

①吴梅:《词学通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页。

②余意:《明代词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③张仲谋:《明代词人群体和流派·绪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页。

④王兆鹏:《明代词学通论·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

⑤张仲谋:《明词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产生的冲突外,《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官方定调不容小觑。作为18世纪文学批评的集大成者,《总目》在批评范式与知识建构等层面均具有典范意义,其集部提要尤以官学的权威性对后世文学史、批评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梳理历来的明词批评会发现对《总目》的引用随处可见,这些引用多为了支撑自我观点,疑义与辩驳者甚鲜,也很少有人关注《总目》明词批评上的问题。钱基博曾谓《总目》的明代文学批评“每有寻声逐响之谈”①,并推陈子龙为明代最优秀词人,言辞间隐现清初与晚明词间紧密的关系,虽篇幅有限却为探讨《总目》词学思想的重要之举。20世纪90年代后,明代文学史书写才逐渐脱离《总目》文学史观的局限,对明词的看法开始改变,但对《总目》明词评价的辨析仍待加强。本文从《总目》定位明词的政治生态入手,通过全面爬梳其收录的明词文献,比勘词类提要的编纂生成机制,发现明词的“式微”实为馆臣加工后的选择性呈现,清廷的政治偏见和消极评判是明词不振的重要原因。而本文以明词和明词批评为题,是基于四库体系收录和评价书籍的双重建构特性,明词主指明代词集的收录及归类等,明词批评指对明词的评价,通常收录中已寄寓了批评立场,而提要批评又为收录提供内在学理支撑,是以二者之间相辅相成,是一个结构严密、思想一体的完整体系。

一、“世运说”:“演退”的明词史建构

《总目》对历代学人和文学的评判,大抵持论公允,惟独论及“明人”这一群体时,几乎全盘贬斥。这不仅是乾嘉朴学与阳明心学在学术理路上的深刻分歧,更是清廷文化统御之术的微妙映现,即借由对前朝学术体系的系统解构,确立新朝在文教道统上的绝对权威。当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之名亲预《四库》修纂,御定典籍去取之际,明人及著述的命运便已注定。而《总目》正是以“世运说”来构建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走向的。

“世运说”是历代文学史建构中很重要的一种说法和观念,它将文学和政治挂钩,强调文运和世运的正相关性,其实质突出的是文学的政治附属特征。《总目》有大量笔墨刻意强调明代文学的这种特性,在《明词综》提要中就明确以“永乐以迄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之间”“万历以后”三个主要时间节点集中营造了明代文学的气运随着明朝的衰败日趋羸弱的整体气象,并以“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②之说来明确明王朝与明代文学间的主从关系。“近三百年文学演变之路是愈演愈退的‘衰变’之路,其总趋势是‘大演退’而不‘大演进’”“明王朝的宿命就是明代文学的宿命”③。此说早已被学界关注,并成为共识。

作为明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目》对明代文学的态度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对明词的整体定位和评价。与所构建的明代文学史图景一样,《总目》中的明词史同样具有强烈的末世文学色彩和官学政治倾向。这首先反应在其词人词作的收录和评价上。《总目》虽非严格意义的文学史著作,但其对历代词人词作的选择和批评,总结起来便是一部中国词史。结合择选的词集及各提要中传达的观点,便可明确《总目》所建构词史之性质和倾向。相较整体的词史建构,在朝代更迭的时间序列中,《总目》提要尤以明代为观照点,强调词运与世运的正相关性,突出其“世运说”。其所建构的明词史发展脉络在时间节点和走向上与“演退”的明代文学史走向俨然相合。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被存目的四种明词集提要中④,其中刘基、瞿佑属明初,吴子孝为中期,施绍莘处晚明,大致符合《总

①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76页。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0《明词综》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62页。

③何宗美,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页。

④分别为刘基《蕉窗蒽隐词》(据馆臣考订作者是刘基,非元代吴琯)、瞿佑《乐府遗音》、吴子孝《玉霄仙明珠集》、施绍莘《花影集》。参见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15-2816页。

目》的明代文学阶段划分和趋势走向。如刘基词提要全篇102字,除斥责“奸巧书贾”外,几乎都在考证作者,并未评价刘词。这除了表明四库馆臣优秀的考证功力外,还不失为一种避实就虚的批评策略。该提要的内容起初并非如此,作为“四库总目之雏形”[①]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就记载着馆臣的最初认识:“其词颇工,而世少流传,朱彝尊选《词综》并未著录。又集句为词,惟王明清《挥麈录》载王安石一首,琯所集《生查子》《菩萨蛮》词数十首,组织无迹,似更胜之。彝尊《蕃锦集》即承是体而作也。”[②]提要就词论词,力求从文学的视野和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尤从史的脉络梳理作者在词创作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成就,在观念与立场上均与定稿不同。重写后的提要调整了思路,不再对刘词本身做正面回应,而这并不符合《总目》会对作者成就作评价和定位的一贯体例。究其根源,初稿中的赞赏之词与《总目》对明词的整体定位相悖是重写的根本原因。《总目》将宋、元词视为一体,如谓白朴词:“非后人之所能,固一望而知为宋元人语矣。”[③]这就割断了元、明词间的关系,而事实上明初词与元词之间的紧密关联已是学界共识,如王昶曰:“明初词人,犹沿虞伯生、张仲举之旧。”[④]由此,《总目》对刘基词的评价便至为关键,而提要的重写尤体现了馆臣的深思熟虑。另一则提要也很能说明问题。在《词林万选》提要中批评杨慎:“其所选录,欲搜求隐僻,亦不免雅俗兼陈。”[⑤]相较于“蒐罗简汰,颇较《草堂》本为善。盖慎原工于词章”[⑥]的初稿,馆臣出于需要重新调整和定位《总目》明词批评的行为再次得到印证。

四库馆臣向来以宋词为标准来评判明词,其评价有时虽看似合理,实则是贬低明词的一种策略。《乐府遗音》提要谓瞿佑古乐府“绮靡软熟”,并批评其词“欲兼学南北宋,反致夹杂不纯”[⑦]“殊不称其名也”[⑧],以宋词为标杆,明谓其词体不纯、词风驳杂。而其最初评价也非如此。《〈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谓其“幼为杨廉夫所赏,风情丽逸,乐府歌词为时传颂”[⑨],不仅从源头探得瞿佑词风来处,并表明其在词坛的接受状况,评价极高且更为切实。提要的最终版与初版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差异的背后是标准的选择问题,即历来文人多以经典宋词为标准来审视明词,如陈霆虽谓瞿佑“工诗词”,但仍认为其词“视宋人风致尚远”[⑩]。佟世南也依“两宋轨则”,谓其“惟以追琢字句点染为工”[⑪],代表了当时学人对瞿词乃至明词的基本看法。但彼时还有另一种声音,也是馆臣最初评价的来源,田汝城最早以“风情丽逸”[⑫]形容瞿词,后钱谦益归结为:“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偎红倚翠之语,为时传颂。”[⑬]可见瞿词评价上有两种声音,前者以宋词为标准,后者则立足明词自身特点。提要的重写表明,馆臣最初选择了后者,后则调整为前者。但提要与前者又有所区别,宋词标准毕竟属文艺范畴,《总目》则更具功利性。是以具体到词作品评上,宋词标准往往

①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编:《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序》,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页。

②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程存目》集部“词曲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2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天籁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02页。

④王昶辑,王兆鹏校点:《明词综·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⑤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词林万选》提要,第2818页。

⑥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集部“词曲类”,第492页。

⑦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乐府遗音》提要,第2816页。

⑧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00《乐府遗音》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31页。

⑨沈初撰,卢文弨校:《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癸集上,《〈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⑩陈霆:《渚山堂词话》卷2《瞿山阳望西湖》,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3页。

⑪佟世南:《东白堂词选初集小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42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16页。

⑫田汝城:《西湖游览志余》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5页。

⑬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只是虎皮大旗,瞿词提要的改动实际上是为了契合《总目》对明词的整体定位和词史建构需要,反映了馆臣据明文观在明词观上所做的动态调整。另如,提要虽称吴子孝词“颇具凄婉之致”,又云其“造诣未深,不能入宋人阃奥”[①],就很有主观压低之嫌,若积极来讲,则为“可望宋人之尘”[②]。《花影集》提要谓施词“多作于崇祯中,大抵皆红愁绿惨之词,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③]。否定的同时,还将其词风与明季将覆的国运相联。但这种说法并无依据,施词中出现的年月全在万历、天启中[④],与明亡之时并不相对。另,施词内容广泛,风格有险邃、娟秀、骈冶、绵惋[⑤]等多种形态,且红愁绿惨不过是诗词中常有的伤春悲秋主题。但“世运说”对后来的明词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陈廷焯说:“词至于明,而词亡矣……明末陈人中,为一时杰出。但气数近小,国运使然。”[⑥]殊不知“国家不幸诗家幸”也是一种极重要的文坛现象。

二、经典回避:被悬搁的明代词人词集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⑦],而“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⑧]。此论道出了目录学的双重功用,其显者乃“甲乙部次”的文献整序功能,其隐者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⑨]的学术史建构意义。《总目》集历代目录学之大成,具体至集部词类亦是通过一套完整的词籍分类体系及提要批评文字,架构了一部体系严整的词学思想史,集中呈现了清廷官方的词学批评标准和价值取向。

《总目》收录的明人词籍情况,是清代官方词学思想的直观显现。其共收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五种词类文献,从著录的五十九种词集看,宋词五十六种,金、元各一,清词一种,明代无;词选类,明代仅《花草粹编》一种,而晚唐五代一种,宋七种,清三种;词话类,宋二种,清二种,明代仅《渚山堂词话》一种;词谱类清代二种。从存目序列看,被存目宋词集十四种,清七种,明四种;词选类,宋、元各一种,明四种,清七种[⑩];词话类宋、元各一种,清三种;词谱词韵明二种,清三种。可见明代词籍数量上并无优势,词集著录更为零,甚至不及各有一种的金、元两代,明代词人刘基、瞿佑、吴子孝、施绍莘仅入存目。相较下,清代词学则生机勃勃。堪称“小四库”的《四库全书荟要》撷《四库全书》及《存目》之“菁华”[⑪],其集部词类收录《御定词谱》《御定历代诗余》《词综》三种皆为清代作品,前二者更系官方御定之典。这就在推崇清代词学的同时,也拉开了明词与清词的距离。《四库全书》的编纂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距清廷定鼎中原不过129载,而词坛创作群体中多有由明入清者,词学发展的延续性不容忽视。

明词的实存状况和风貌究竟如何?历史的真相往往在对照中浮出水面。以《总目》为节点,前有康熙敕修的《御选历代诗余》,后见嘉庆王昶辑《明词综》,二者皆为明词的发覆表微之作。《历代诗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玉霄仙明珠集》提要,第2816页。

②张仲谋:《明词史》,第185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花影集》提要,第2816页。

④《花影集》有三次时间记载,为乙丑:天启五年(1525);壬子:万历四十年(1612);辛亥:万历三十九年(1611)。参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续修四库全书》(第17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383、394页。

⑤顾乃大:《秋水庵花影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42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8页。

⑥陈廷焯:《词坛丛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8页。

⑦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81页。

⑧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册),第931页。

⑨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册),第863页。

⑩其中《群贤梅苑》不知作者,据提要推断当在明末清初间,而馆臣未做朝代划分,是以不做统计。

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余》在词家类别上已显恢弘气象,其多出的"方外""闺媛""妓女"三类词人多达30位[①],较之金、元两朝犹有过之。虽则该著仅缀以词人生平梗概和著作的简单介绍,然在词人的甄选水准上,较今天的明词史也毫不逊色。所录朱明词坛英华,除上述存目四家外,更有高启、马洪、杨慎、陈霆、张綖、王世贞、汤显祖、沈宜修、陈子龙、夏完淳[②]等对明词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者。《明词综》的内容则更为丰富。作为一部词坛接力成果,朱彝尊在《词综》完成后就已埋首辑录工作,惜书稿未竟而卒,后王昶继成其帙,是以其正式成书时间在嘉庆七年(1802)。朱氏虽极力诟病明词,但不认为"无合作"[③],王昶选词虽"以南宋名家为宗",亦指出明词"不可尽废"[④]。是书共收录词家387人,词作604首。其中女词人叶小鸾、沈宜修各8首、5首,屈大均7首,陈子龙17首,为全书之最。反观刘基不过8首,高启2首,瞿佑1首,杨慎11首。这就尤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词派和女词人为代表的闺阁词传达着别样的信息:这绝非一部衰亡史,词在明王朝倾圮的余晖中绽放出璀璨之花,为清词中兴拉开了瑰丽序幕。

当我们将《历代诗余》《明词综》纳入比较视野,可知《总目》选裁之局限。或谓词居集部之末,又逢十余年修书倦怠之期,受冷落似在情理之中。而事实上,文体地位的尴尬尚在其次,政治对学术的隐秘形塑还是主要原因。《别集类》总叙云:"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⑤]此处讲明别集的取舍问题,也是把握《总目》明词批评的一个基本纲领。《总目》对历代词集的取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分野,元代及之前的词集,多加甄录,明代及后的,严加删剔。一明一暗的双重批评尺度,揭示了清廷厚古薄今的学术取向,也映射出对明代文学的特殊顾忌。

当然,四库馆臣所面临的复杂困境及背后的深层原因也是要考虑的内容。从文献规模看,馆臣面对的是篇章弥富的明词。据《全明词》《全明词补编》统计,有明作词总人数2019人,词作总量25000多首[⑥],且这个数量还未见底。其次,明词文献的混乱状况更添难度。较之宋代一人一集的相对整齐格局,明词的体例可谓淆乱。或如瞿佑《乐府余音》《余清词》之一人多集,或为文集附录之散珠碎玉,很多文人别集后都附有不单独成卷的词,或几首或数十,难以统计。更有将词置于诗、赋之前或穿插其中者,这就使注重体例和文体秩序的馆臣大为恼火。再者,明代文人以曲入词的创作实践,制造了辨体困境,加大了工作量和难度,也强化了自身负面形象。最后,学术资源上明词面临着经典未立的尴尬。宋词的经典化在明末清初已基本完成,除单行词集外,也有很多词总集可供借鉴。而在《总目》编纂时,明词的经典化进程尚未完成,并无可靠选本参用。因此除了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文体演进与时代思潮的复杂互动也起了一定作用。

通过对明别集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极丰富的词文献和词批评资源。因为明人以词附集的编纂习惯,大量词人词作得以留存,有些还进入了馆臣视野。提要明确记载含有词集的共54家,词作总量不少且词人身份多样,堪称特殊的明词库。被著录9家为:陶宗仪、李昌祺、倪谦、韩

①此处实应为30人,其中"闺媛"中张红桥并非人名,林鸿妻之说属杜撰,故下文也当为165人。具体考证参见张仲谋:《明词史》,第77-81页。

②《御选历代诗余》作"夏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3册),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4页。

③朱彝尊,王森编:《词综·发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④王昶:《明词综·序》,第1页。

⑤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8),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81页。

⑥据《全明词》卷首《出版说明》统计:"共得词家一千三百九十余人,词作约两万首。"参见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页。《全明词补编》:补编所收词人达六二九人,词作五〇二一首(含存疑词五十首,残词或句七则),其中《全明词》未收词人四七一人之词作三〇七六首,已收词人一五九人词作一九四五首。参见周明初,叶晔补编:《全明词补编·后记》,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邦奇、孙承恩、朱朴、任环、徐熥、卢象昇。存目的45家为:明宣宗、周叙、郑棠、叶盛、王越、左赞、桑悦、蒋冕、程楷、王廷相、陈霆、周用、刘节、万镗、顾磐、张綖、崔桐、夏言、林希元、詹泮、徐阶、王教、龚用卿、周显宗、陈如纶、马汝彰、刘乾、汪柏、万士和、王时槐、刘尧诲、陈瓒、蔡国珍、何源、王世懋、于慎思、吴宗儒、陈与郊、陈荐夫、周履靖、汪廷讷、王永积、杨思本、沈谦等。这些人词作数量不一,多则如夏言342首[①],少如陈瓒仅“一首”[②]。这些统计并非全部,仍有不少未被述及,如刘基《诚意伯文集》被著录,其《写情集》存词252首[③],陶安《陶学士集》有词22首[④],张凤翼《处实堂集》存词8首[⑤],范守己《御龙子集》有自为一卷的词5首[⑥]等。另有文集已佚者,词作也无处可寻,如詹泮《少华集》“杂文、诗、词共三卷”[⑦],何源《心泉集》“诗赋、歌词三卷”[⑧]等。这表明实际上的明词远比《总目》记载丰富。

三、剑走偏锋:以偏概全的明词批评

《总目》明别集提要以“词附集末”的书写体例及片言居要的批评话语,构建起一套明词评判语系。这些散见的批评碎片,是我们全面了解明词、深入明词接受真相的重要文本依据。

明别集提要对明词虽以贬为主,但更客观,有些评价甚至很高,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总目》“明无词”的定位。如评陈霆词:“惟诗余一体较工,其豪迈激越,犹有苏、辛遗范。”[⑨]这句话原也平常,但放在整个《总目》的明词批评语境中,则是仅有的赞赏之语。明代无著录词集,即使被存目的刘基等四位词人词作,提要也一味贬抑,相较之下,这个评价就显得尤不和谐。按照惯例,馆臣必要做修改,方才与其明无词的定位相符,因此其得以留存应属侥幸。别集和词归类不同,二者在编纂时间、观念协调上很难保持绝对一致。《总目》之前各地方进呈书目中的稿本提要,也多有赞赏之词,记载着清人对明词的最初认识。如谓汤显祖“填词妙绝一时,《牡丹亭记》而外余曲尚多,悉为其子开远所焚”[⑩]。谓王九思“重资购乐工学琵琶,海搦谈尤善,工小词”[⑪]。但更多地方仍是馆臣对明词的刻板印象,如沈谦以“填词称最”[⑫],其三卷词被存目[⑬],提要评其作“香奁”,谓其人“放诞”[⑭]。认为张綖是“刻意于倚声者”,其词与诗均“多艳体,颇涉佻薄,殆‘玉台’‘香奁’之末流”[⑮]等。因体例特殊,很多提要虽非专为词而言,却力求概括词人词风,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总目》词类提要中明词批评的

①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45-391页。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8《济美堂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67页。

③刘基:《诚意伯文集·写情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3-306页。

④陶安:《陶安文集》(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701-706页。

⑤张凤翼:《处实堂集》(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3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41页。

⑥范守己:《御龙子集》(卷2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6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7-98页。

⑦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6《少华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29页。

⑧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8《心泉集》提要,第2467页。

⑨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6《水南稿》提要,第2413页。

⑩沈初撰,卢文弨校:《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癸集下,《〈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3册),第324页。

⑪沈初撰,卢文弨校:《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癸集上,《〈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3册),第229页。

⑫沈雄:《柳塘词话》卷1《去矜填词称最》,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90页。

⑬沈谦:《东江别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9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80-307页。

⑭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80《东江集钞》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12页。

⑮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6《南湖诗集》提要,第2424页。

不足,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整体看,明别集提要中的明词评价总量有限,正面评价更是凤毛麟角。但负面点评并非毫无意义,有的很能切中明词特点,是全面了解明词及馆臣心态的重要材料。对夏言词的评价就颇具学术价值。夏言词享誉明代,王世贞赞其为"以词名家者"①,其盛誉延至清代。《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称其"长于应制,小词亦优"②。但提要说:"未相时以词曲擅名。然集内词亦未甚工。诗文宏整而平易,犹明中叶之旧格。"③夏言乃台阁重臣,馆臣敏锐注意到了权势所带来的文坛红利,通过考察断定其名实不副。难得的是在指出夏言诗文的台阁体特点之时,也一并品出其台阁体词风倾向④,可谓慧眼如炬。这在夏词批评史上应是最早的中肯之评,同时也表明馆臣是最早关注台阁体词的批评者之一。另如谓张綖诗多艳体,"盖刻意于倚声者,宜其诗皆如词矣"⑤。论及诗、词间的文体互动问题,明确其词对诗歌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此外如谓张凤翼词"多论传奇之语"⑥,同样敏锐捕捉到"以曲入词"的文体衍变走向。对于明词的缺点和不足,馆臣也多所指摘,如批评其"多率意之作,不留心于陶炼"⑦"有纵横排奡之气,而颇涉粗豪"⑧等,言简意赅却颇能中明词之弊。

总体来看,馆臣对明词的指摘更多,原因有三:其一,明面上论词以两宋为宗,而实则更注重词的教化功能。明词多俗、艳体,此尤为馆臣诟病,而否定的背后还深藏着清廷的政治动机。《四库全书》工程启动之前,朱彝尊一再革明词艳、俗之弊,其醇雅理论被官方认可,成为《总目》论词的一把利刃。但朱氏论词虽以"雅正为鹄"⑨,却指向文学本位中的雅俗之争,其态度远比《总目》客观。馆臣虽曰"一概诋排,亦未为公论"⑩,但依诗教择选和定位词人的本质难以撼动。而从词自身看,其"胎带的俗艳色彩"⑪"好之者终不绝"⑫的脉流承传,到明代都找到了理想栖息地,这很难为注重风教的清廷接受。朱彝尊有《风怀》二百韵诗和《静志居琴趣》长短句,代表着艳情诗词的真正高度⑬,尚被叱责"流宕艳冶"并要以"风雅之正"的名义"刊除"⑭,这就使得该类创作上的任何创新和突破都很难被正视。是以明词的命运,在《总目》是审美问题,但更是政治问题。

其二,明人不重体例,文集编纂上率性而为,文体秩序感不强,经常词、曲不分。身份、视角的差异使得文人、学者在文学和文体的认识上有很大偏差。王象晋将秦观、张綖词收编一处,在馆臣看来就极荒谬:"越三四百年而称为合璧,已自不伦,况綖词何足以匹观,是不亦老子、韩非同传乎?"⑮但王象晋本意是为表彰张綖"修词家功臣"⑯的词谱造诣。至于馆臣所诟病的明人词、曲不分问题,也非明人独有。朱彝尊也曾苦恼:"元人小曲……往往编入词集。然按之宋词,如……诸阕,已为曲

①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页。

②沈初撰,卢文弨校:《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癸集上,《〈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3册),第244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6《桂洲集》提要,第2427-2428页。

④张仲谋:《明词史》,第173-174页。

⑤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6《南湖诗集》提要,第2424页。

⑥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8《处实堂集》提要,第2469页。

⑦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5《程念斋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08页。

⑧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9《庞眉生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79页。

⑨陈匪石:《词综》,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62页。

⑩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9《类编草堂诗余》提要,第2804页。

⑪孙克强:《唐宋词学批评史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6页。

⑫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乐章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80页。

⑬陈廷焯:《竹垞艳词空前绝后》,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26页。

⑭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3《曝书亭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45页。

⑮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秦张诗余合璧》提要,第2819页。

⑯王象晋:《秦张两先生诗余合璧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42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62页。

韵滥觞矣。是集间有采录,盖仿杨氏《词林万选》之例,览者幸勿以词曲混一为讪。”[①]清人的后出转精,离不开明人的努力。且明人也有开拓,瞿佑把古乐府、词、曲汇为一编,是为消除各文体间的界限[②],后人称其词“与宋之苏、辛诸名公齐驱”[③],看中的正是其以曲为词的方式对词所做的第三次革新。中国古代以高行卑的文体规律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文体来承担日趋丰富的表情达意功能。是以越后出的文体,承担的表象功能便越明确和细微,这也是后出文体往往不能胜任前出文体功能的原因所在。以此看,词对诗、明词对宋词来讲都是一种进步。提要谓张凤翼词多论传奇之语[④],说的就是戏曲文学叙事因子对词体表现手法的补充和发展。因此以往认定的明词浅俗香弱的特点、词曲不分的混乱体例,实则可能预示着文体及风格的突破和创新。

其三,明代出版业混乱、伪书众多等问题。最典型的莫如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其中收宋词人61位,而《总目》著录、存目宋词共70种,有60种来自该书。可该书仅被“附存其目”,馆臣的不满在其“随得随雕,亦未尝有所去取”[⑤]的体例和漏选名家的行为。但其实毛晋此书还在不断出版中,馆臣理解有误,还因不了解明代的出版行业。随着出版的商业化以及出版权向民间的开放,“时效性”已成为出版业的新特点,从文学传播学来说,随得随雕恰是值得肯定的。再如馆臣所谓漏选问题,实则《总目》亦未收入毛晋汲古阁藏贺铸《东山词》宋刊残本[⑥]。这传达出一种态度,四库馆臣对词并不重视,明词则更不在重点关注范围。

四、“另眼”看明:明词的时代性

馆臣“另眼”看明,在评判明词时所表现出的思想观念多有偏颇。而明词及其理论前承宋元余绪,后启清词中兴,是中国文学及理论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像李攀龙在《古今诗删》中删去宋词,把明诗直接唐诗的做法,作为选家的眼光不为不可,但对国家型工程来说,就未免偏颇。而以官方身份颁行的《总目》在学界掀起的骇浪对明词造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尽管明词及其理论客观上也存在不足,但显然政治权利和官学势力的过度介入,使馆臣刻意构建了中国词史上的一个“低谷”,其中的片面性显而易见。“衰变论”虽也部分地揭示了明词演变的一些面貌,但对明词及其理论的根本定性和定位是错误的。尽管多消极评判,但《总目》对明词及其理论的研究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结果走向。长期以来,“宋词”成为论词的主要准则,也是学界贬抑明词的主要原因,但这一标准的合理性仍值得探讨。在今天,明词也常被概以“浅、小、艳、俗”[⑦]等贬义特征。学者们相继提倡以异量之美来重审明词,仅从词的外表特征考察明词是不够的,应该深入到学理层面,形成明词批评的独特体系。这就意味着两个体系的建构,一是明词原本的体系,二是明词批评的体系,且以前者之探讨促进后者之自然生成。作为国家力量和学术力量的统一体,《总目》已开了先河,它在“世运说”和宋词标准的支配下择选词集,既对明词原本的体系进行了梳理,又构建了明词批评体系。尽管这两者在今天看来仍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但却指出了一条可取的路径,即未来明词研究首先要做的,是在诸多明词集中厘清一个基本的体系,否则散乱的文献整理和

①朱彝尊:《词综》,发凡,第6-7页。

②陈水云:《明清词研究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③陈敏政:《乐府遗音·乐府遗音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422册),第48页。

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8《处实堂集》提要,第2469页。

⑤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00《宋名家词》提要,第2819页。

⑥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海: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1701页。

⑦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页。

支离的局部或个案研究都难以得明词之全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体系应由其内部价值体系支配,而非随意区分的粗略排列。由此在词的原始文本形态、存录位置和流通载体的记载和保存上,《总目》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不言而喻。

明词尤其是晚明词确实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我国受传统文体观念的影响,尤为强调文学与道德、政治的关系,相对忽略其与个性、生活的关联,轻视时俗、流变的作品和风格。而词在根源上就与传统审美异样,可以说自诞生之日起,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诗教对词的改造便从未停止。虽然词作为独立文体,有自身的文体特性和演变规律,但在强势文体对弱势文体的长期规训和渗透下,词的本色逐渐淡化,在功能上也开始扮演诗、文角色。词的雅化在南宋就已形成,而元、明时期,随着社会文艺生态的变化,明人对词的认识也开始向传统回归。“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①],明人对词的定位是一次充分认识词体美学特征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讲,“衰变论”本质上是雅词的消亡,而非明词创作及理论的衰亡。

长期限于文人雅文学的思维定势,使我们很难对大众通俗文学报以真正欣赏的态度。学者将“世俗化、喜剧化、民歌化”视为“明体词的特色”[②]是符合这一时代走向的。明词尤其是晚明词特征突出,写作对象转向了普通市民,创作由宋词的唯美主义转向穷形尽相的写实主义,语言风格也由典雅精致变为鲜活直白。明词的特殊性不在于创造了如宋词般的千古名篇,而是传递出情趣丰富、个性突出的“明人”精神内核。这是明代复古运动和阳明心学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产物,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于馆臣而言,他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特征,却很难正确认识其价值,也启发我们以新的视角并立足时代来正视明词。

[责任编辑:李　炜]

①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385页。

②张仲谋:《明代词人群体和流派·绪论》,第10页。